

重庆出版社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第四辑

重庆文史资料



重庆文史资料

第四辑

(总第四十八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文史资料,第四辑/徐朝鑑主编;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编.一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1

ISBN7-5366-5016-7-K·213

I. 重 ... II. ①徐 ... ②中 ... III. 文史资料
—重庆市 IV. 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118 号

重庆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编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主编 徐朝鑑 副主编 杨耀健

责任编辑 秦树艺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奇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0 千 插页 4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66-5016-7/K·213
定价:10.00 元

目 录

“红岩魂广场”筹建经过	厉 华 陈建新	(1)
歌乐山下埋忠骨 烈士陵园松柏青	孙丹年	(5)
缅怀周均时烈士	曹庞沛	(13)
重庆市庆祝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回述	徐朝鑑	(16)
文物考古五十年	刘豫川 邹后曦	(27)
汇南汉墓群遗址的保护利用	吴天清	(53)
大足石刻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始末	李正心	(57)
大足县佛头盗割案纪实	李正心	(68)
记綦江县石门寺文物被盗案	唐文胜 胡世博	(76)
接管四川旅行社	江礼华	(83)
解放散记	方靖四	(84)
记进军大西南二三事	闻晓华	(87)
同教会中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重庆市公安局一处	(90)
忆发生在“三反”运动中的一件事	李莹华	(100)
美人店事件始末	罗敦才	(109)
回忆“剧本创作讲习会”	孔祥云	(118)
战时陪都忆往	沈清尘	(122)

我在战地党务处的日子	郭心秋(136)
陪都电话事业梗概	王正元(144)
十二姊妹重逢山城	任秀珍(150)
日机袭渝纪实	王正元(154)
重庆府邮政一等局	朱珠(159)
市政建设谱新篇	郑永明(161)
公营重庆建筑公司创业纪要	郑体思(168)
山城交通话今昔	胡懿(172)
榨菜发展与涪陵	吴朝弟(182)
我与复旦大学和相辉学院的渊源	王文彬(193)
九三学社与中央大学	袁李来(197)
国立十五中今昔	张义富(202)
重庆大学的十大变化	程地全(204)
对重庆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回忆	江泽佳(209)
记院系大调整	金锡如(214)
任白戈同志二三事	厉慧森(219)
萧华清在协进中学	萧鸣锵(222)
忆龚灿光先生	彭斯远(226)
陈攸序为傅三乾祝寿	陈兰荪(229)
顾颉刚与《文史杂志》	李丛(232)
陈铭枢隐居缙云山	李董华(236)
黄埔老人薛彦夫	何宏钧(240)
我参加辨认杨虎城将军遗体的经过	
	蒋祝华口述 王德润整理(250)
白川大将上名山	陈未云(255)

宋美龄飞赴松既	罗敦才(257)
国民党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之死	张 谦(260)
蒋濂国其人其事	魏德钧(263)
罗汉寺第十八代方丈释竺霞法师	朱 朱(273)
法尊法师传略	甘文峰(281)
儒医朱焕然二三事	朱 邦(285)

“红岩魂广场”筹建经过

厉 华 陈建新

1999年，新兴的重庆直辖市迎来了建国50周年、解放50周年、“11·27”烈士殉难50周年三个50周年纪念。为了迎接这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文化局的领导下，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从1988年底就开始构思、策划1999年度拟开展的系列纪念活动，祈能以之为送走旧千年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新千年的到来泼洒一笔浓烈的重墨。其中一项就是全面改造烈士墓陵区和原“中美合作所”阅兵场。

1999年7月10日下午，市委市府主要负责同志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检查“11·27”烈士殉难50周年暨重庆解放50周年纪念活动准备情况，并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副市长李德水，老同志刘隆华、黄友凡，市委办公厅主任王大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翁杰明、市计委主任赵公卿、市建委主任王根芳、市财政局副局长马千真、市规划局局长何水平、市园林局局长刘楚雄、沙坪坝区区委书记魏益章、市文化局副局长李自治、王川平、张根发及市文化局有关处室负责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及其他馆领导。会议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滕久明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厉华关于纪念活动筹备工作的情况汇报，然后集中对烈士墓陵区和阅兵场的改造项目展开了研讨。市计委主任赵公卿、市建委主任王根芳、市财政局副

局长马千真、市规划局局长何永平、市园林局局长刘楚雄、沙坪坝区区委书记魏益章、副市长刘隆华先后发表意见，副市长李德水作了指示。最后，市委书记贺国强对烈士陵园的总体规划、50周年纪念活动和改造项目作了明确的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根据市领导的指示精神，当天晚上，计委、建委、文化、规划等部门邀请有关专家，对改造工程进行了论证，决定由重庆市设计院、重庆市园林设计院、重庆建筑大学城规设计院和重庆英才公司各出一套设计方案，由建委和文化局主持比较论证。随后，7月19日、7月22日、7月28日、8月3日、和8月4日召开了五次设计方案论证会，最终确定采用市设计院设计的方案。这个方案将烈士墓陵园区和阅兵场联成一体，比较有气势，能较充分体现红岩精神的内涵，而且设计了独特的《红梅赞》音乐墙，最终的方案还吸取了建大方案中演出平台部分内容。广场最初拟定的名称是“11·27纪念广场”，最后定名为“红岩魂广场”。

在建委和文化局的主持下，在规划局的大力支持下，业主单位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设计单位市设计院、承建单位市三建公司、市港庆公司和施工监理单位市政监理公司通力合作，从8月10日开始动工修建广场。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克服连绵阴雨天气和地质条件复杂的困难，只用了108天就修建完毕。

1999年11月26日，“红岩魂广场”正式落成，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邢元敏、重庆市文化局局长王洪华、副局长李自治、王川平、张根发等出席了由市建委主任王根芳主持的剪彩仪式。1999年11月27日，贺国强书记和包叙定代市长率重庆各界群众数万人在“红岩魂广场”隆重举行了“11·27”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大会。

“红岩魂广场”是全国第一个以烈士精神命名的广场，它使烈士陵园的窗口形象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极大地改善了重庆市的对外开放的形象，充分体现了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对

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重视,对开发重庆独特的革命文化资源、塑造精神文明名牌精品的决策的高瞻远瞩,也充分体现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抓革命文化创精品工程的决心和力度。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著名新闻媒体均进行了大量报道,称赞广场的修建是重庆市充分重视发挥革命文化资源优势,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实质性成果。

“红岩魂广场”分为瞻仰区和纪念区两个部分,占地面积22000平方米。它依托歌乐山,遥望嘉陵江,宽21米、长18米的人行桥廊凌空架设,将两个部分上下贯通,浑然一体,广场气势恢宏,格调沉稳。

从纪念区至瞻仰区的步行梯道依势而起,肃穆凝重,拾级而上,则可见歌乐山层峰凸呈,重峦叠嶂。在苍松翠柏的映衬下,以“浩气长存”为主题的赤色花岗石烈士群雕耸拔入云,伟岸雄奇,犹如镶嵌于万绿丛中的巨型红宝石,体现出“在那青翠的歌乐山巅仰望黎明”的意境,使人顿生景仰之情。梯道墩台的正面是用汉白玉琢成的以“采花”、“献花”为主题的少年形象和两列花圈浮雕,寄托着人们无尽的崇敬和思念。瞻仰区的顶端是复斗形的墓冢,长眠着先烈们的忠骸,成为人们祭拜的主体。与此相呼应的,还有烈士诗文碑刻林和《血与火的洗礼》大型壁画地下纪念厅。

从瞻仰区沿阶而下,可立于宽阔的演出平台上俯瞰广场纪念区。走入纪念区中央,回头仰望,中轴线外两列18根花岗岩纪念巨柱,将人们的视线再次引向烈士群雕。演出平台后部用水晶汉白玉砌成的碑体横向展开,上面镌刻着邓小平题写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成为中轴线上的点睛之笔。中轴线南北向两侧宽敞的斜面草坪,喻意“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的先烈遗愿。两侧花坛之间的纪念柱,柱顶红梅怒放,取形“牢破梅开”;四边柱壁镌刻着烈士的遗诗遗言,观者从中

可领略革命烈士的精神风采；挺拔的柱体象征着烈士的不朽人格。轴线尽头的广场东端，《不朽》浮雕墙衬托着刻有《红梅赞》词曲的音乐壁，与瞻仰区的烈士群雕遥相对应；晶莹透澈的清水，从音乐壁顶部平缓、均匀地流过弧形壁面，寓意时间虽在不停地流失，但红岩英烈的精神却凝固在历史的长河中。“红岩上红梅开……”的歌声柔美而昂扬，在广场上空婉曼缥缈，隐约入耳，昭示着逝者在生者心中永存！

夜色苍穹中，广场流光溢彩，斑斓绚丽，烈士群雕雄姿巍峨，朵朵红梅闪耀夺目。人民群众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从黑暗走进光明，用自己的奋斗迎来光辉的明天。

歌乐山下埋忠骨 烈士陵园松柏青

孙 丹 年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即“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位于重庆西北郊，占地面积 2.1 平方公里，在 1939 年 5 月到 1949 年 11 月的 10 年时间里，这片土地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处重要的历史舞台，上演过一幕幕令人震惊的剧目。

历史上的“国民党军统重庆集中营”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两个机构，1943 年至 1945 年，这两个机构一度并存于歌乐山下的同一地域内。

军统重庆集中营于 1939 年设立，包括枣子堡看守所（后迁白公馆）、望龙门看守所（后与白公馆看守所合并）、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集中营（后与白公馆看守所合并）、渣滓洞看守所以及无数秘密囚室。这些看守所和秘密囚室，是军统特务利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器材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囚牢，也是革命志士展开英勇不屈斗争的特殊战场。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狱中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留下的诗文和遗物，是教育青少年的宝贵教材，在今天已广为传诵。在此被囚禁过（其中很多被杀害）的革命者有：杨虎城将军及妻子儿女、张学良将军、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原东北军 53 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原中共西北特支委员宋绮云一家、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原川西特委军委委员、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车耀先等；还有因设在军统电台内部的中共特别支部遭破坏、“小民革”武装起义、1947 年 6 月大逮捕、《挺进报》

被破坏、1948年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民革川康武装起义以及军运、工运、学运等被捕牺牲的革命者。1949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溃败，军统特务在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系列大屠杀，死难者近三百人，渣滓洞房屋遭焚毁。

军统重庆集中营所留下的遗址遗迹，有白公馆看守所旧址、渣滓洞看守所旧址、戴笠的杨家山公馆、松林坡公馆（即戴公祠，张学良将军在此囚禁过，杨虎城将军在此惨遭杀害）、杨家山秘密囚室（囚禁过杨虎城将军一家）、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囚禁过叶挺将军）、黄家院子秘密囚室（囚禁过廖承志同志）、大屠杀刑场遗迹等。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1943年春成立，1945年底结束。这是中美双方为了共同抗日而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情报机构，由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海军部联合组织，分别隶属于双方最高当局，在对日作战的军事情报的侦译传递方面发挥过作用。但是由于其主任戴笠、副主任梅乐斯的反共立场，这个机构实质上成为一个特务训练的大本营，是国民党为了提高军统局的政治军事地位，获得美国援助；美国为了获取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加强对蒋介石政权的控制而设立的国际性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留下的遗址遗迹有：“中美合作所”总办公室遗址、梅园（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公馆）、美方国际电台遗址、阅兵场、狼犬室、大营门等。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大军来到山城重庆，举行了隆重的人城式。这时候，渣滓洞余烟未尽，一片焦土，白公馆一带尸横遍野，烈士们的血衣、遗物扔得满山都是，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气。所有的房屋都空着，门窗桌椅不翼而飞，被附近胆大的居民搬走了。

最先来到这里的是解放军二野12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将敌人未及销毁的文字资料和其他物品草草收集后就开走了。随后重庆军管会公安部（后改名为西南公安部）的同志接管了这片土地。据当时任军管会公安部总务处行政科长的刘德明同志讲，总务处

派他带着几位同志于 1950 年 1 月 20 日左右来此接管，当时，原地下党的同志正协同解放军将烈士遗体收殓入棺，几百具棺材停在松林坡下（据说那几天全重庆的棺木都被买光还不够）。组建了管理委员会，李公健为主任，罗忠和刘德明任委员，一处处地接管房屋物资，逐一统计，连果树都计了数的。此后，西南公安部的同志从三个方面保护和建设了这片土地：一是大力种植，绿化环境；二是尽可能保护、维修文物建筑；三是向观众进行宣传教育。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组织力量修建“死难烈士合葬墓”和烈士纪念碑，于 1955 年落成。1956 年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旧址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 年代初修建了烈士墓四周的堡坎。烈士墓由重庆民政局管理至 1980 年移交烈士陵园。

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强调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又值《红岩》小说出版，轰动海内外。全国最大而且保存最完好的一处阶级教育旧址受到各级党政部门重视，经重庆市委多次研究，1963 年 2 月组建“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1988 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筹备小组，组长为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段大明同志，副组长胡光，组员有王若、刘德明，由重庆市文化局局长朱鼎固同志具体负责，其他成员主要是重庆市博物馆的职工，脱险志士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参加，经费由共青团四川省委拨给。任务是接管重要的文物建筑，举办史实陈列展览，要求当年“11·27”纪念日向观众开放。

筹备阶段非常艰苦。筹建工作指挥部设在位于钟家山半坡上的梅园，根据脱险志士的回忆和各方面知情者提供情况，在原渣滓洞看守所的废墟上按原貌重建了一楼一底的房屋，全面维修了白公馆、松林坡的文物建筑，编撰陈列大纲，制作展览。十多名职工的家都在市中区，他们单身住在原“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的破房子里，而且非常分散。据参加过筹建工作的同志回忆说，那时人烟稀少，冷冷清清，到处是深深的茅草和带刺的铁丝网，只有荒僻

的小路，各个文物点之间相距好几里路，他们就在各点之间奔走忙碌，遇到下雨滑溜难行。博物馆馆长、老红军朱鼎固同志带头苦干，晚上常常在煤油灯下加班，有时加班到凌晨，就用报纸铺在地上睡一觉。另一位同志说，那时职工不分专业，需要干啥就干啥，维修房屋、管理各个参观点、接待观众、讲解，什么都干。面积这么宽，职工这么少，观众又太多，真是忙都忙不过来。还在筹备期间观众就自发来了，每天有几十批观众，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星期天也照常开放（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因为观众太多，星期天要想关门也不行。

展览馆于 1963 年 11 月 27 日建成开放，总馆设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展点有渣滓洞、白公馆、松林坡等处。据当时任解说员（后来担任副馆长）的余正群同志讲：开馆后首批来参观的是各国驻中国的外交大使团。此后观众潮水般涌来，每天数以万计，外宾也很多，犹以日本及东南亚的友人为多。

1965 年 9 月，周恩来总理到重庆，本来要视察烈士陵园，因事耽搁未能成行。他听取了关于烈士陵园情况的汇报后，让重庆市委领导同志转告烈士陵园负责同志：“维持现状，不扩建，可修复，劳改单位迁出，道路逐步修好。”周总理的指示为烈士陵园的发展，为后来确定烈士陵园的保护面积，划界立桩、制止乱挖乱建乱占土地，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江青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致使烈士陵园遭受了极大的破坏。陈列馆被封闭，烈士家属被牵连，保护范围内牵涉到的 30 多家单位（包括 6 个生产队），个别人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乱挖乱建、蚕食破坏的情况非常严重。十年动乱使烈士陵园遭受了浩劫。那个时期，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日夜坚守在岗位上，文物保护员进驻各个保护点，日夜守护维修，尽力保护文物建筑。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数次冲击烈士合葬墓，还有激烈分子图谋砸毁文物，我们的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劝

说，挺身而出阻止他们，终于保护陵园未遭毁损。

烈士陵园的历届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都极其重视，态度十分明确。文革结束后，为了完善文物保护面积的法律手续，据原烈士陵园副书记刘俊明说，1977年省里召开文物保护工作会议，按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凡公布为保护单位的都要划出必要的保护范围。他说：“当时烈士陵园范围内关于土地和建筑的纠纷特别多，我们前去制止乱占乱建行为时斗争非常激烈。我们的方针是寸步不让。”为了在保护范围上取得法律确认，在当时的市委书记丁长河的支持下，刘俊明等同志多次到成都、北京反映情况，极力呼吁。1983年向国家文物局反映后，由国家文物局向全国人大代表反映，侯宝林、李何林等全国人大代表交上了一份议案。这份议案由全国人大秘书处批转：“由国务院处理回答。”后来，原烈士陵园副馆长卢光特同志赴北京，通过国家文物局去督促提案的落实。提案的办理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呼吁保护烈士陵园的文章。

1982年8月上旬，重庆市政府向四川省政府递交一份报告（由当时的重庆市文化局长郭汝魁以市政府名义起草），四川省政府于8月21日批准，即省政府[1982]第147号文，同意划出保护面积的四至界限，标志立桩。市政府拨出45,000元经费，市设计院派出测量队，根据军用地图测绘出等高线，定做了水泥桩。2.1平方公里的面积，包括歌乐山几座山峰的东面山坡，许多标志点都在陡峻的山脊上，在茂密的树林荆棘丛里，158根水泥界桩，全都是人工扛上去的，工作非常艰苦。1983年，从5月至7月，经过三个月的苦干，划界立桩工作全部完成。这项措施有力的制止了乱挖乱建现象。此后派出专人巡视保护界桩，1996年重庆市国土局又派人全面普查，并补栽缺损界桩。

1984年6月30日，重庆市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布告，布告第二条为：“在陵园保护范围内，要严格保

持现状或维持原貌，严禁新建、扩建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严禁改变地形、地貌、水体；严禁钻探、采石、毁林、开荒、放牧、狩猎等活动。陵园保护范围以外五百米的环行地带为卫生防护和建设控制区，这个区域内的环境风貌应与文物保护区相协调，凡新建、扩建项目，必须事先征得文化部门同意，并经城市建设规划部门批准。”第三条为：“陵园保护范围内，除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外语学院、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现有的部分教学、生活区和农村生产队外，其余单位必须按省政府川府函〔1982〕147号文件规定，限期迁出，并将土地和建筑设施移交歌乐山烈士陵园，不得转让其他单位和个人。”第五条为：“陵园保护范围内和附近的企事业单位，凡在保护范围内及卫生防护地带排放废水、废气、废渣和产生噪音者，要限期治理。其治理办法，要事先与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协商，并纳入保护使用合同。”

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文物保护范围，其保护措施通过布告广为宣传，振聋发聩，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效果很好。陵园制定严格的文保管理制度，设立“文保科”和专职文保巡查员，定时巡查保护；又在各个点的工作人员中设立兼职文保人员，每天必须填写文保工作日记；一旦发现异常现象立即报告，现场解决。巡视制度多年来持之以恒，制止了许多蚕食破坏，附近居民逐渐具备文保意识，破土修建前必向烈士陵园反映，向文化局打报告，不经批准不得动工。为保护烈士合葬墓和烈士群雕的环境风貌，四川外语学院的教学大楼修建时，经协商作了改动，向校内移进80米。限期迁出的单位中，白公馆煤窑停产关闭，污染严重的松山化工厂已经搬迁大部，余下的部分也正在搬走。渣滓洞后山乱葬坟墓另移他处，壮志路商业门面搬走了八家。此外，部分已决定要搬的单位正在协商，逐步解决。还在陵园内的道路、排洪沟、堡坎等，也在巡视保护之列。

1988年，国务院公布歌乐山烈士陵园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陵园职工更感任重而道远。

1991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到烈士陵园视察,他凝目注视烈士合葬墓良久,问陪同参观人员:墓后半山上的楼房是谁修的?这不好,破坏了景观。并立即指示市委书记萧秧同志说:“这件事一定要抓好。”李瑞环同志还对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但是保护与发展永远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有些曾经禁止修建的建筑,如像位于杨家山戴笠公馆下面的重庆汽车发动机厂新建厂房,经过长期协商,最终还是建起来了。也有个别单位和个人不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在保护范围内建起了违章建筑,如像1993年沙坪坝区“歌乐山风景旅游开发办公室”修建索道时,烈士陵园巡视员现场制止无效,由重庆市文化局紧急报告国家文物局、市委办公厅、市委宣传部等主管部门。得到报告后,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共三人飞赴重庆,会同重庆市文管会、市委宣传部、市规划局、建工学院等部门,由市文化局主持,于1993年3月11日在烈士陵园召开“重点文物保护区内修建空中索道可行性论证会”。虽经主管部门和专家们极力反对,但索道修建单位强调“这个项目是经沙坪坝区人代会通过,政府批准的,又由离退休老同志集资,材料已经买齐,投资得不少了”,只好“下不为例”,不了了之。一年多以后,在离“杨虎城被害处”不远的山凹里,外商投资修建步云山庄,其倾倒土石垃圾直接影响到白公馆看守所旧址,也经过激烈的争论,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数次要求拆除,最后也不了了之,山庄照样建起来了。这两件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1992、1993年前后,到渣滓洞看守所旧址参观的观众们都要发出疑问:后山上那一大片坟墓,是掩埋的烈士忠骸吗?每天,工作人员都要作无数次耐心解释:“不是的。”原来,那一片土地是沙坪坝区森林管理站管辖的范围,近几年来,附近居民擅自在此建坟,